

#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研究

黄佳豪<sup>1</sup>, 张敏<sup>1</sup>, 宋留阳<sup>2</sup>, 易慧敏<sup>1</sup>

(1. 安徽建筑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安徽 合肥 230022;

2. 广西民族大学 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要]** 该文基于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的面板数据,通过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协调特征。研究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系统与经济系统发展指数均呈上升趋势,发展态势良好;两系统间协调发展水平逐年提高,但空间发展不均衡,总体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差异格局;成渝城市群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耦合协调度趋向协同发展,三大区域间差异呈缩小趋势,长江经济带协调度水平整体向好发展。最后,从加强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三个方面提出建议。

**[关键词]**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 经济发展; 长江经济带

doi: 10.3969/j.issn.1673-9477.2024.01.003

**[中图分类号]** F3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24)01-0017-09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村居民的收入稳步提高,但农村区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日益突出,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方面尤为明显。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所发挥的保护与促进功能,可充分保障农村居民生活质量与增强村民可行能力。<sup>[1]</sup>因此,全面加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制度建设是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在2019年颁布实施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做好“三农”工作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提出:“促进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向农村倾斜,逐步建立健全基本公共服务评价体系,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sup>[2]</sup>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探究二者协调发展水平对于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意义。长江经济带作为引领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排头兵,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把握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关系、缩小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差距、增强上中下游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可为我国东中西部区域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提供参照。

## 一、文献回顾

基本公共服务是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之上,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民生需求的服务。<sup>[3]</sup>关于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研究,研究成果主要

集中于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及数字经济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两方面。

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不均衡方面,部分学者研究认为,当前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在基础设施建设、公共服务数量和质量方面存在不足,且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发展不均衡。郭美荣等(2021)<sup>[4]</sup>认为,我国乡村公共服务发展与城镇相比仍处于较低层次,乡村地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存在总量不足、质量不高的问题;李军鹏(2019)<sup>[5]</sup>指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各组成部分之间发展不均衡,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公共住房保障、养老保险体系发展相对滞后;李丹等(2019)<sup>[6]</sup>采用静态和动态面板回归模型,经多维度分析,认为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和交通等基础设施方面与城市之间有明显差距。

数字经济对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作用方面,张永奇等(2023)<sup>[7]</sup>认为,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具有重要作用,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空间溢出效应在地级市中表现最为明显;许潇丹等(2023)<sup>[8]</sup>通过实证考察数字经济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赋能作用,发现数字经济在政府治理效率、财政透明度、技术创新氛围和人口密度变量调节下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呈现正向动态调节效应;洪茹菲(2023)<sup>[9]</sup>认为,数字经济发展对生产力具有提振效能,地方政府通过深入实践

**[投稿日期]** 2023-10-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19BSH165)

**[作者简介]** 黄佳豪(1978-),男,湖南永州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公共管理。

数字乡村建设,可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

近年来,学界关于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生态环境保护等与经济之间的协调发展关系展开的。<sup>[10-13]</sup>多数学者研究发现,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时序差距。王俊霞等(2023)<sup>[14]</sup>认为我国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并不是完全同步的,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总体上滞后于经济发展水平;陈江等(2023)<sup>[15]</sup>通过研究发现,长三角城市群中约一半以上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远超经济发展需要,约12%的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滞后于经济发展所需;迟瑶等(2016)<sup>[16]</sup>认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的协同发展程度和圈层辐射作用范围的大小有关,且前者的发展整体滞后于后者。也有学者认为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具有明显的相互作用关系。熊兴等(2019)<sup>[17]</sup>通过实证分析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发现,县域经济发展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具有短期抑制作用,基本公共服务对经济发展具有正向促进作用;董素娟等(2023)<sup>[18]</sup>通过构建固定效应模型分析得出,经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促进作用显著,且对不同维度的基本公共服务的影响水平不同,表现在基础设施供给和就业与社会保障供给作用最为明显;黄雅晴(2022)<sup>[19]</sup>运用面板计量模型和空间杜宾模型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可带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且相邻地区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空间外部性,对经济发展存在正向促进效用。

综上所述,针对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的相关研究日渐丰富,但所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多是围绕省市级范围展开的。这对于因城乡壁垒等原因而导致社会经济条件落后的农村地区来说缺乏研究的针对性,不能完全反映农村地区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现状,且鲜有关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关系的研究。基于此,本文以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为研究对象,建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对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耦合协调度水平等进行研究,以期为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良性互动提出建议。

## 二、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机理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存在着密切的互动关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是促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效率供给的基础,且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高

低从多维度影响着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不仅有利于增强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和获得感,提高农村居民的福利水平,且有助于改善地区投资环境、提高农民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sup>[20]</sup>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是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物质保障,也直接影响着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实现程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和供需错位会深层次制约区域经济的发展。而完善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则可以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为经济持续发展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保障。首先,农村地区在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日臻完善,可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达性,从而吸引劳动力集聚,提升地区经济发展效率<sup>[21]</sup>;其次,通过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可增加农村居民的福利收益,激活居民的消费意愿,更好地发挥“内循环”消费机制作用,使之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sup>[22]</sup>;最后,优化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可将农村潜在生产力转化为现实生产力<sup>[23]</sup>,使得公共服务产品供给满足民生需求,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现实基础,从而让更多农民享受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成果。

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具有显著的支撑作用。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是由政府为主导的,无论各地方政府反映在财政激励和政治激励上的支出偏好有何不同<sup>[24]</sup>,不可否认的是,经济发展水平一定是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充分条件。一方面,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政府可发挥宏观调控职能,增加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上的财政资金投入,从而补齐农村地区在教育、医疗、公共文化等方面的短板,实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优质化;另一方面,经济发展系统可以通过市场要素资源进行生产活动,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系统提供各种物质发展条件,化解农业农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夯实农村地区发展的基础支撑,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

## 三、研究设计

### (一) 研究对象

本文的研究地域为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具体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川、贵州、云南。为便于分析长江经济带区域内部差异,将11个省市按照上中下游划分。上游地区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四省市;中游地区包括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下游地区包括上海、江苏、浙江、

安徽四省市。其中,上中下游分别位属于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和长江三角洲城市群。

(二) 研究方法

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客观赋权法,具有准确、简便等优点<sup>[25]</sup>,可确保研究结果更真实有效。熵值法计算的步骤如下。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目的在于消除不同指标数据单位不同的问题。为避免赋值无意义,在数据计算过程中加上一个大于 0 的正数,本文在数据处理中加上 0.0001。

正向指标:

$$X_{ij} = \frac{X_{ij} - \min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0.0001 \quad (1)$$

负向指标:

$$X_{ij} = \frac{\max X_{ij} - X_{ij}}{\max X_{ij} - \min X_{ij}} + 0.0001 \quad (2)$$

计算第 j 项评价指标的熵值:

$$P_{ij} = \frac{X_{ij}}{\sum_{i=1}^n X_{ij}} \quad (3)$$

$$E_j = -k \sum_{i=1}^n P_{ij} \ln(P_{ij}), \quad (k = 1/\ln(n), k > 0, 0 \leq E_j \leq 1) \quad (4)$$

计算第 j 项评价指标的权重:

$$g_j = 1 - E_j (j = 1, 2, \dots, m) \quad (5)$$

$$w_j = \frac{g_j}{\sum_{j=1}^m g_j} \quad (6)$$

基于各指标标准化和权重得出的结果,采用线性加权法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两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进行度量,其计算公式如下:

$$u_i = \sum_{j=1}^m (w_j * X_{ij}) \quad (7)$$

式中,i(i=1,2,3……n)表示地区;j(j=1,2,3……m)表示指标数据。

2.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度模型是指两个及以上系统或系统要素之间相互作用、不断磨合的互动关系。其体现子系统内部或系统整体由无序向有序发展的历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具有交互作用关系,根据两系统间的耦合关系构建耦合度模型:

$$C = \frac{2\sqrt{U_1 U_2}}{U_1 + U_2} \quad (8)$$

其中,C 为耦合系统的耦合度,C ∈ [0,1]; U<sub>1</sub>、U<sub>2</sub> 分别表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综合指

数。虽然耦合度模型可以有效评价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的交互耦合强度,但无法反映系统间协调状况的好坏。因此,为全面反映两系统间的协调关系,引入耦合协调度模型:

$$D = \sqrt{CT} \quad (9)$$

$$T = \alpha U_1 + \beta U_2 \quad (10)$$

其中,D 为耦合协调度,D ∈ [0,1]; T 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协调指数,反映两者间整体发展水平对协调度的贡献; α、β 为贡献系数,因为两个系统在研究中发挥的重要性相同,故均赋值为 0.5。

为深入分析二者之间的耦合协调程度,根据已有研究,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 10 个等级,具体的划分标准如表 1 所示。

表 1 耦合协调度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D	等级	耦合协调度 D	等级
0.0~0.09	极度失调	0.5~0.59	临界协调
0.1~0.19	严重失调	0.6~0.69	初级协调
0.2~0.29	中度失调	0.7~0.79	中级协调
0.3~0.39	轻度失调	0.8~0.89	良好协调
0.4~0.49	濒临失调	0.9~1.00	优质协调

(三) 评价指标体系构建

本研究根据《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三五”规划》对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的界定,选取教育、医疗卫生、公共文化等作为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的类目,同时进一步参考黄涛等(2021)<sup>[2]</sup>的研究成果,为了有针对性地反映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的发展状况,最终从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基础设施、基本公共文化五个维度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指标体系。其中,知识资源往往是农村地区的稀缺资源,也是影响农村地区发展的最大制约因素<sup>[26]</sup>,故选取普通小学生师比与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数量,意在反映农村地区的基础教育资源水平;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数(张)、村卫生室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比重(%)等可体现出各农村地区对医疗卫生发展的重视程度;社会保障对地区居民的生活发挥兜底作用,故选用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来反映社会保障水平的高低;选取供水普及率(%)、乡镇文化站(个)、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等指标来衡量地区公共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文化的发展程度。

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必须从人力、物力方面给予最根本的支持,即必

须解决资金不足的难题<sup>[27]</sup>。为全面反映农村经济发展现状,本文借鉴迟瑶等(2016)<sup>[16]</sup>的研究成果,从经济规模、经济效益、生活水平三个维度,选取第一产业占GDP比重(%)、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

重(%)、城乡居民收入比(%)等9个指标,计算经济发展指数。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结合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现实的实际情况及相关数据的可获得性、可操作性,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的评价指标体系,见表2。

表2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层	系统层	指标层	权重
农村基本 公共服务 评价指标 体系	基本公共教育	普通小学生师比	0.051
		人均义务教育阶段专任教师数量(人)	0.089
	基本医疗卫生	每千人医疗卫生机构数(张)	0.060
		每千人卫生机构人员数量(个)	0.094
		村卫生室占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数比重(%)	0.052
	基本社会保障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人数(万人)	0.042
		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平均标准(元/人·年)	0.136
		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万人)	0.071
	公共基础设施	集中供水的行政村占行政村总数的比例(%)	0.041
		供水普及率(%)	0.047
		燃气普及率(%)	0.155
	基本公共文化	乡镇文化站(个)	0.111
		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0.026
		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	0.026
	经济发展 评价指标 体系	经济规模	第一产业占GDP比重(%)
农林牧渔总产值(亿元)			0.103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亿元)			0.139
经济效益		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元/人)	0.152
		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元/人)	0.115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元/人)	0.176
生活水平		农村居民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	0.058
		城乡居民收入比(%)	0.068
		恩格尔系数(%)	0.099

#### (四)数据来源

本文以长江经济带沿线11个省市作为研究对象,选取11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所选指标数据均来源于2016—2021年《中国社会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及各省统计年鉴等公开数据,对个别省市部分年份的缺失数据,采用插值法补充。

#### 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水平分析

由图1可知,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综合指数呈波动上升趋势。其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综合指数由0.371上升到0.591,经济发展综合指数由0.311上升到0.483。这说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水平平均得到一定程度的提升。原因在于长江经济带各

省市重视广覆盖、多层次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使得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总体得到改善。同时,这还与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有关。文件指出2035年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这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建设指明了方向。在这期间各地政府持续优化财政支出结构,推动地区经济发展,同时,地区经济发展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起到反哺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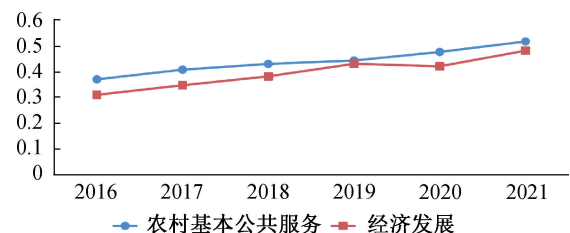


图1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综合得分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整体呈

现稳步上升态势,但省域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差距较大。其中下游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安徽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从图 2 中可看出,江苏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逐年稳步上升,在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中居于首位。这与近年来江苏省致力于解决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过度供给和资源闲置,积极探索公共服务长效供给机制有关。值得一提的是,上游地区中的四川省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远高出同处于上游地区的重庆、贵州、云南。究其缘由,虽然

四川省受地理位置影响,经济总量和财政收入相对较少,但近年来四川省通过不断加大农村地区财政资金投入,特别是在基本公共教育方面,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扶持政策。因此,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显著提升。总体而言,2016—2021 年间,长江经济带整体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的提升主要得益于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各级政府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重视,且不断探索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发展的新路径,促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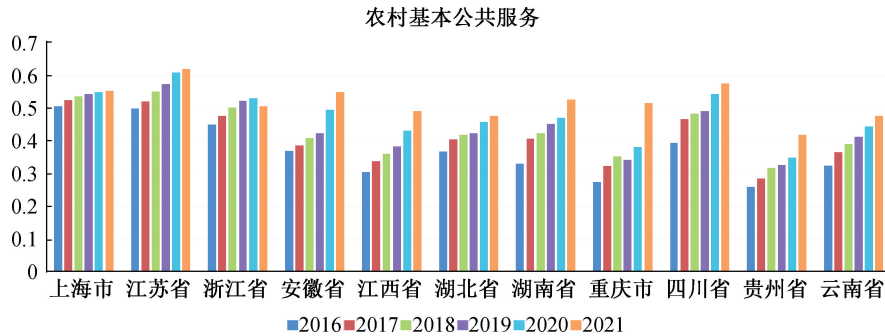


图 2 2016—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指数

长江经济带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向好态势,其不足之处在于经济发展地域特征明显,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下游苏浙沪皖地区经济发展总量遥遥领先于中游和上游地区。经济发展指数总体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差异特征。由图 3 可知,沿江流域内经济发展平均指数由 2016 年的 0.311 上升至 2021 年的 0.483,经济发展水平得到提高。江浙沪皖四省市位于长三角地区,区位条件优越,技

术、资金、人才等要素聚集,经济发展具有天然优势。上游成渝双城凭借着“虹吸效应”大量吸收周边劳动力、资本等生产要素<sup>[28]</sup>,使得两省经济发展在上游地区较为突出;而贵州省和云南省受区位条件影响,经济总量小且贫困人口较多,因此经济发展较慢。中游赣鄂湘三省,虽然经济社会基础良好,但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不足,高新技术产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水平在沿江流域内处于中等水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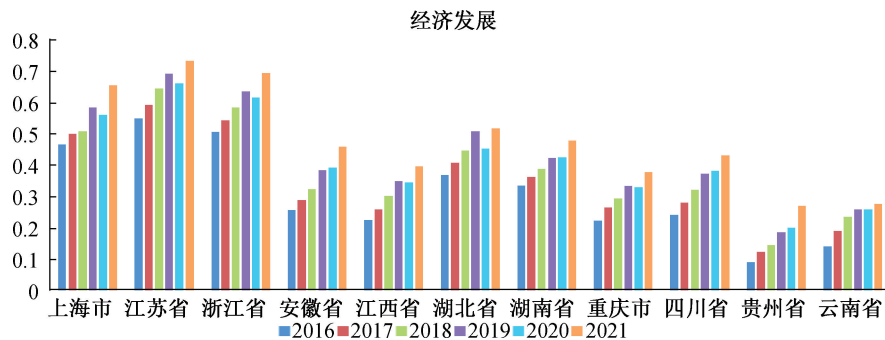


图 3 2016—2021 年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经济发展指数

### 五、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的时序及空间演变

#### (一) 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分析

根据图 4 分析可知,长江经济带 11 个省市 2016—2021 年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逐年上升,由 2016 年的 0.571 上升至 2021

年的 0.701,耦合协调阶段由临界协调发展到中级协调。其中,上游地区由 0.479 上升至 0.639;中游地区由 0.566 上升至 0.693;下游地区的协调度水平最高,由 2016 年的 0.668 上升到 2021 年的 0.770。这表明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系统协调性逐渐增强,原因在于随着公共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和公共财政投入的增长,各省市提供全瞄准

式公共服务精准供给,使得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得到提高,同时带动地区经济水平的发展,而经济发展又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提供物质基础,二者互为助力,协调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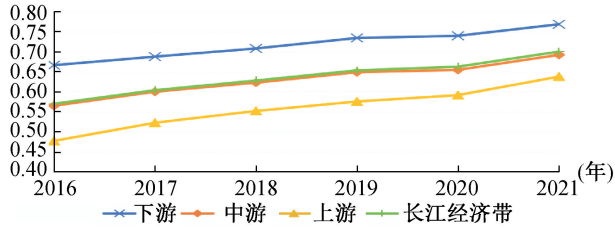


图4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特征

具体来看,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的增长速度是最快的,2016—2021年耦合协调度水平增长率达到33.5%。城乡一体化是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困境得到解决的最终出路。<sup>[29]</sup>上游地区社会经济条件相对落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上升空间较大。近年来因在加快城乡公共服务一体化进程中抓住时机,不断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从而实现与经济系统协调发展。而下游区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性虽然在逐年提高,但二者协调发展度

提升速度缓慢。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主要是指由供给主体、供给对象、供给内容在一定秩序下相互关联组合而成的整体<sup>[30]</sup>,其可持续发展是指在一定经济发展水平下能够持续运行,为农村居民输送基本公共服务。如何建立以需求为导向的农村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模式,完善可持续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是长江经济带进一步推动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所应全面统筹考量的。

## (二) 耦合协调度空间演变分析

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度的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的区域差异,大致呈现“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格局,见表3。2016—2021年,耦合协调度总体均值分别为0.571、0.605、0.629、0.654、0.664、0.701,耦合协调度总体向着优质协调的方向演进。根据耦合协调度的高低,将上中下游地区划分为三个梯队:下游的苏浙沪皖地区两大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属于第一梯队;中游的江西、湖北和湖南三省份的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66—0.693,属于第二梯队;上游地区四省市协调度水平虽然增速较快,但在沿江流域中仍处于低值区,属于第三梯队。

表3 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

地区	年份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下游地区						
上海	0.698	0.716	0.723	0.751	0.745	0.777
江苏	0.724	0.746	0.773	0.794	0.797	0.822
浙江	0.692	0.714	0.737	0.760	0.757	0.770
安徽	0.556	0.579	0.605	0.636	0.664	0.709
平均值	0.668	0.689	0.710	0.735	0.741	0.770
中游地区						
江西	0.513	0.544	0.575	0.606	0.622	0.665
湖北	0.607	0.638	0.658	0.682	0.675	0.705
湖南	0.578	0.621	0.638	0.662	0.670	0.709
平均值	0.566	0.601	0.624	0.650	0.656	0.693
上游地区						
重庆	0.499	0.542	0.569	0.582	0.596	0.666
四川	0.556	0.603	0.629	0.655	0.676	0.707
贵州	0.394	0.435	0.464	0.498	0.515	0.581
云南	0.465	0.515	0.551	0.573	0.584	0.603
平均值	0.479	0.524	0.553	0.577	0.593	0.639
长江经济带均值	0.571	0.605	0.629	0.654	0.664	0.701

苏浙沪皖地区位于长三角经济区域之内,地方财政实力雄厚。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支持政策,有力地促进了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质量的提升。其中,江苏省由于近年来持续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不断深入挖掘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影响因素,使得农村基本公共服

务与经济发展协调度水平在长江经济带中居于首位。值得注意的是,安徽省虽同处于长三角三省一市中,但其创新驱动发展动力不足,经济发展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带动作用较弱,故两系统协调发展水平与下游地区其他三省市差距明显。上游地区的贵州省由于其地区经济发展受限,进而导致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存在散、乱、差的困境<sup>[31]</sup>,2021年的协调度水平仅处于临界协调阶段。另外,云南省、江西省、上海市分别位于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省市。由表3可知,这三省市之间耦合协调度差异明显,2021年协调度分别为0.603、0.665、0.777,协调度值呈现阶梯状分布,上海市远高于云南省和江西省。进一步分析: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指数来看,2016—2021年上海市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指数均在0.5以上,而云南、江西省的发展指数虽在逐年上升,但直到2021年仍小于0.5,与上海市差距显著;从经济发展指数来看,上海市经济发展指数在2021年达到0.6以上,而江西省最高值未超越0.4,云南省经济发展指数则更低,2021年最高值仅介于0.2—0.3之间。因此,不同省市之间的两系统协调发展差异性显著。究其缘由,上海市地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经济实力雄厚,区域资源禀赋均质化,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具有良好基础,在推进基本公共服务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农村基本公共服务水平整体得到提高;江西省近年来虽然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得到较快发展,但在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发展还存在诸多不足,主要原因在于其农村经济发展滞后,城乡二元体制造成城乡资源分配不合理;云南省受地理位置等条件的限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整体较低,且城乡差距大,城乡之间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均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总量不足,故耦合协调度水平一直为较低值。

综合来看,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存在空间上发展不均衡的问题,除以上分析外,还主要表现在下游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在研究期间内均高于中游和上游地区。例如2016年下游地区协调度均值为0.668,而中游地区直到2021年才超越0.668达到0.693。上游地区发展更为缓慢,2021年协调度水平仅为0.639,低于下游地区2016年的水平。这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上中下游地区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发展差距大进而导致各地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差异性,由表3可知,经济较为贫乏的上游地区2016年协调度水平仅为0.479,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下游地区,2021年的协调度水平达到

0.668,两区域协调度差异明显;另一方面,上中下游地区地方政府的财力不同,对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起到的支持力度有明显差别,长江三角洲地区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远高于长江中游和成渝地区。具体来看,下游地区江浙沪皖社会经济基础条件优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向内形成良性循环,故耦合协调度始终处于领先地位;中游地区在承接下游地区空间溢出效应的基础之上,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虽得到一些助力,但由于受困于城乡壁垒的影响,耦合协调度处于中等水平;而上游地区受区域条件限制,经济基础薄弱,资源匮乏,仅靠政策扶持难以达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协调发展的条件。故要实现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协同治理,仍然任重而道远。

## 六、研究结论与对策建议

### (一)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长江经济带11个省市2016—2021年的面板数据,构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经济发展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熵值法、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二者综合发展水平及协调发展的动态演进特征,主要结论如下。

1. 2016—2021年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水平均呈现波动上升趋势,说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质量逐年提升,经济发展具有较强潜力。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水平与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紧密相关。

2. 长江经济带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的耦合协调度总体表现为由临界协调过渡到中级协调状态,但11个省市耦合协调类型异质性明显。苏浙沪皖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在流域内属于领先地位,而贵州和云南耦合协调度仍处于低值区。三大区域协调度呈现出“下游>中游>上游”的空间差异格局。

3. 从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演变来看,上游地区耦合协调度发展速度快于中游和下游地区。成渝城市群与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度差异在逐渐缩小,长江中游城市群耦合协调度发展水平与长江经济带总体水平始终保持一致。整个流域呈现出低值区与高值区趋向协同发展状态。

### (二) 对策建议

1. 坚持区域协同发展理念,加强政策引导与财政支持。

一方面,政府在制定政策时应从全局出发,合理配置区域内公共服务资源,积极探索区域内公共服

务资源共建共享新路径,从供给端入手制定针对性政策,建立以农村居民需求为导向的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模式,努力补齐各地区在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短板,统筹各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使之与经济发展形成良性循环;另一方面,政府部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加大对农村地区的支持力度,重视农村地区的经济建设,夯实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的社会基础条件,从需求端入手精准识别农村居民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有针对性地增加涉农财政支出,完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

2. 制定差异化发展政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质量。

在整体发展理念下,还应考虑 11 个省市发展的差异性。平衡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建设可持续发展的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的基础。下游地区应继续保持经济发展优势,走农村基本公共服务高质量发展道路,建立基本公共服务精准化供给模式,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推动沿江流域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发展;中游地区应积极利用当地资源优势,推动地区创新驱动发展,提升地区内生发展动力,提高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上游地区因地理位置等不可抗力因素,经济基础薄弱,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不足,应以完善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基本公共服务为主,着力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3. 发挥区域间带动作用,优化基本公共服务空间格局。

根据《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的构建长江经济带“一轴、两翼、三极、多点”的发展框架,在沿江流域加快构建由基本公共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公共文化等组成的基本公共服务共享共建发展格局。确保苏浙沪继续发挥其优势功能,增强空间溢出效应,促进各资源要素在长江经济带循环流动和合理配置,辐射带动周边地区发展,推动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和经济发展优质协调区向周围扩散。深化上游和中游地区与下游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与互动,形成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协商合作格局,最终实现长江经济带上中下游地区协同发展。

## 参考文献

[1]李雪萍,龙明阿真.村庄公共产品供给:增强可行能力导致减贫——以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雅江县西俄洛乡杰珠村为例[J].社会主义研究,2011(1):97-103.

- [2]黄涛,王艳慧,关鸿亮,等.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多维贫困的时空耦合特征研究[J].人文地理,2021,36(6):135-146.
- [3]国务院关于印发国家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十二五”规划的通知[EB/OL].(2012-07-11)[2023-09-19].[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2-07/19/content\\_7224.htm](https://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2-07/19/content_7224.htm).
- [4]郭美荣,李瑾,马晨.数字乡村背景下农村基本公共服务发展现状与提升策略[J].中国软科学,2021(7):13-20.
- [5]李军鹏.新时期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思路与对策[J].新视野,2019(6):52-59.
- [6]李丹,裴育.城乡公共服务差距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J].财经研究,2019,45(4):111-123.
- [7]张永奇,陈睿,刘梦贤,等.数字经济、人口流动与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J].统计与决策,2023,39(20):35-39.
- [8]许潇丹,惠宁,韩先锋.数字经济赋能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用机制与动态调节效应研究[J].经济问题探索,2023(8):132-146.
- [9]洪茹菲,吴建华.数字经济、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与农民农村共同富裕[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44(6):123-132.
- [10]贾婷月.公共基础教育配置效率:资源优化还是资源浪费[J].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17,19(1):49-60.
- [11]付芮,邵蕾蕾,朱旺旺.我国医疗卫生支出效率与区域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研究[J].卫生经济研究,2023,40(8):63-68.
- [12]马逸初,孙晓红,马斌.京津冀城市群公共文化服务与经济高质量发展耦合协调研究[J].经济与管理,2024,38(2):17-26.
- [13]周文慧,钞小静.黄河流域数字基础设施、经济发展韧性与生态环境保护的耦合协调发展分析——基于三元系统耦合协调模型[J].干旱区资源与环境,2023,37(9):1-9.
- [14]王俊霞,郝博爵,李梦雨,等.我国基本公共服务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关系研究[J].科学决策,2023(2):43-60.
- [15]陈江,李秀伟,江俊丽.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演化的时空演化特征研究——以长三角城市群为例[J].华东经济管理,2023,37(5):18-28.
- [16]迟瑶,王艳慧,房娜.连片特困区贫困县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时空格局演变关系研究[J].地理研究,2016,35(7):1243-1258.
- [17]熊兴,余兴厚,王宇昕.基本公共服务与县域经济发展关系研究——来自三峡库区重庆段区县的例证[J].西部论坛,2019,29(6):110-121.
- [18]童素娟,孙云皓,黄锦程.经济发展水平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影响及对策——基于浙江省山区 26 县的实证分析[J].浙江树人大学学报,2023,23(5):37-46.
- [19]黄雅晴.我国基本公共服务地区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研究[J].时代经贸,2022,19(6):9-12.

- [20]周利平,李翔,左缘缘.乡村振兴与农村基本公共服务耦合协调研究:时空演变及影响因素[J].新疆农垦经济,2023(2):13-27.
- [21]刘倩倩,吴相利.人口收缩背景下东北三省市域经济与基本公共服务协调发展测度与驱动机制[J].经济地理,2023,43(6):22-32.
- [22]张润君,朱韵洁.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研究——以甘肃省14个市(州)为例[J].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22(3):109-123.
- [23]蔡秀玲,乔术好.福建省基本公共服务与经济发展耦合协调度分析[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7):146-158.
- [24]官永彬.财政分权、双重激励与地方政府供给偏好的异质性[J].重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02-111.
- [25]惠调艳,郭筱.西部地区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水平测度[J].统计与决策,2019,35(11):124-128.
- [26]郑洲.四川民族地区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能力提升研究——以教育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2011(5):166-174.
- [27]李现丽.着力提升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J].农业经济,2022(6):30-32.
- [28]陈健,包滢晖,伍国勇.经济圈空间经济关联与增长:基于泛成渝地区的经验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39(4):64-72.
- [29]张鹏飞.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存在的问题与优化策略——以黑龙江省农村为例[J].法制与社会,2018(20):176-177.
- [30]都倩.我国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体系建设的政策选择[D].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15.
- [31]储勇,王浩伟.长江经济带城乡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及其影响因素分析[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9,35(5):45-53.

[责任编辑 李 新]

##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Rural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HUANG Jiahao<sup>1</sup>, ZHANG Min<sup>1</sup>, SONG Liuyang<sup>2</sup>, YI Huimin<sup>1</sup>

(1.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 Anhui Jianzhu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22, China;

2. School of Sports and Health Sciences, Guangxi Minzu University, Nanning, Guangxi 5300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panel data from 1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from 2016 to 2021, this article constructs a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dicator system for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uses entropy method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to study the coordination characteristics between rural basic public services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basic public service system and economic system development indexes in rural areas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are both showing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development trend is good; The level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between the two systems has been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but the spatial development is uneven, showing an overall spatial difference pattern of “downstream>midstream>upstream”;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ispatch of the Chengdu-Chongqing urban agglomeration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urban agglomeration tends to develop synergistically,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hree major regions are narrowing down; The overall coordination level of the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 is improving. Accordingly, Suggestions are proposed from three aspects: strengthening policy guidan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formulating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policies, and optimizing the spatial pattern of basic public services.

**Key Words:** basic public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economic development; Yangtze River Economic Belt